

是非红楼

千秋功罪 难于辞达

俞平伯年以后的岁月

周文毅 著

1954年

SHI
FEI
HONG
LOU

生于自然里，死于自然里，咱们的生活，咱们的心情永远是平静的。

传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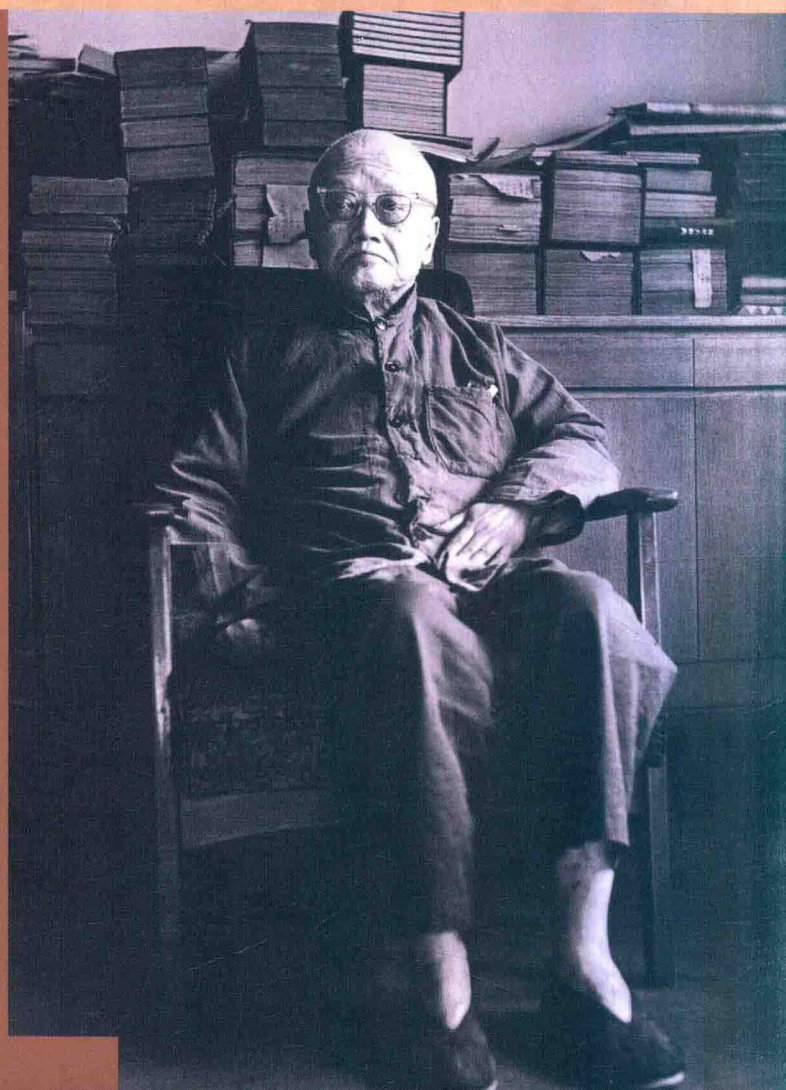
传记文丛

乐天

知命

安闲

养拙



百花
Baihua



传记文丛

是非红楼

俞平伯1954年以后的岁月

周文毅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GUOHUA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是非红楼:俞平伯1954年以后的岁月/周文毅著. —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9.2
(传百·传记文丛)

ISBN 978-7-5500-3131-9

I. ①是… II. ①周… III. ①俞平伯(1900-1990)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3806号

是非红楼:俞平伯1954年以后的岁月

周文毅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赵霞 许复
书籍设计	绛紫
制 作	周璐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16 印张 19.75
版 次	2019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8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3131-9
定 价	39.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51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
严霜烈日都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



传记文丛

丛书编委会

主 编：斯 日

副主编：胡仰曦

编 委：崔金丽 郭 卉

既是历史又是诗

——“传百·传记文丛”总序

斯 日

“传记是历史还是文学”，当我敲下这几个字的时候，正是冬日暖阳铺天盖地洒过来的时候。阳光照在落地窗玻璃上折回并散开，瞬间变为成千上万条的光束，在欢快地跳动着，熠熠生辉。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我却在面对它说着一个如此陈旧的话题，顿感有些愧对太阳的温暖和欢快，不过我又想到果戈理1842年在寒风刺骨的俄国冬天说的“可如今是这么个规矩……所以，没有办法”，也顿感经典作品的魅力，穿越时间和空间的重重阻隔，你需要的时候恰巧出现。

传记文学是写人的艺术，将人的生平事迹以文学艺术的手法呈现，是传记的核心所在。理想人生是人生最佳状态，传记文学作为一种记录人生的文体，其最佳状态应是理想传记，那些经过时间的陶冶而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里不乏理想的传记，如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司马迁的《史记》、卢梭的《忏悔录》、罗曼·罗兰的《名人传》，等等，今天依然是我们爱不释手的经典著作。

这些经典传记之所以流传百年经久不衰，成为理想传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将历史性和文学性完美结合在一起，既真实而完整地叙述了传主的生平事迹，又生动而深刻地塑造了传主的精神个性，对传主的命运、行为和性

格做出了合理而准确的解释。真实性与文学性，这就涉及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陈旧话题——关于传记的文类属性。

关于传记的文类属性，学界的观点从未达成一致，真实性使传记隶属于历史，虚构性使传记隶属于文学。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说：“历史是无数传记的结晶。”思想家拉尔夫·爱默生说：“确切地说，没有历史，只有传记。”诗人叶芝说：“一切知识皆传记。”在中国，《史记》的问世开启了传记与文学的携手共进。胡适为中国现代传记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不仅自己撰写传记，还动员他人写传记，他更是精彩总结了传记文学的价值：“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胡适这句话，既肯定了传记的真实性，也强调了传记的虚构性，为传记文学正了名。今天学界一致认可传记是跨学科的文类，胡适的贡献是首屈一指的。

《传记文学》杂志创刊于1984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为《传记文学》撰写了题为《关于传记文学》的“创刊词”，并发表在1984年3月5日《人民日报》上。他在文中说：“‘传记文学’顾名思义，应该既是传记，又是文学。作为传记，它应该完全忠于历史，不容许虚构，更不能随意编造。……作为文学，它不仅要有一定的文采，更重要的是抓住所写人物的特征，生动地刻画出人物的性格和形象，而不是枯燥无味地记流水账。这就是把历史和艺术相结合，……也就是鲁迅对《史记》的评语：‘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既是历史又是诗。这当然是不容易的，但应该努力这样做。”如今，《传记文学》走过34年的积累与发展，确立了良好的思想文化品位，在国内外人物思想类读物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正是因为一直秉持以文学的笔触真实呈现历史的办刊方向，做到所刊发的文章“既是历史又是诗”。

2018年1月11日，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天，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文学杂志社与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达成战略合作意向，商定全方面合作方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将依托传记文学杂志社优秀选题，推出名人传记、人物述评等方面图书，同时利用各自的平台资源，加大推广力度，实现双方优势互补。这套“传百·传记文丛”即是战略合作的第一个项目，陆续推出《传记文学》杂志策划的理想传记图书。

“传百·传记文丛”，其含义如其字面意义，也超越了其字面意义。

“传”是多音字，一个读chuán，另一个读zhuàn。《现代汉语词典》对chuán的解释为：“传授，传播，传导……”此时，“传百”的含义为：打造优秀的传记图书，并使之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流传下去。《现代汉语词典》对zhuàn的解释为：“解释经文的著作；叙述历史故事的作品；传记，记录某人生平事迹的文字……”此时，“传百”的含义为：推出数以百计的传记作品。此外，“传百”含有另一层意义：“传”代表传记文学杂志社，“百”代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表达一种理想，即强强联合，打造传记文学流传百年的经典著作。

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中强调文学作品开头的意义，他说：“开始同样也是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的门槛，进入词语世界的门槛。……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开篇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传记写作也同样强调如何成功地走进传主波澜壮阔的一生，理想的开头即代表着接近了理想的传记作品。作为一套立志于不断推出理想传记的丛书，“传百·传记文丛”刚刚出生，它的“传记”刚刚开始书写，希望“传百·传记文丛”，正如其名，一直流传开去，不止百部。

是为序。

2018年12月11日

序

梅新林

历史是一种经验，更是一种智慧。在粗略阅读周文毅学友所著《是非红楼——俞平伯1954年以后的岁月》（以下简称《是非红楼》）之后，心中不禁顿生诸多感慨。追本溯源，发生于1954年的“批俞”事件是由俞平伯先生的红学研究引发的，然而迄今为止红学界对此尚未作出系统的梳理与总结，而身处红学界之外的文毅则从1999年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广搜博寻，取精用宏，在“批俞”事件过去六十多年之后，终于写出了一部有关俞平伯先生1954年以后人生的传记，所以我的感慨即同时发之于1954年的“批俞”事件本身以及由此催生的这部颇具学术容量的传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这两者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实已难分彼此。在我看来，这部学术性传记具有以下三重明确指向与价值。

一是历史还原。传记的核心价值是真实，所以写作传记的第一要旨是历史还原。《是非红楼》第一章《荣辱逢同年》即从发生“批俞”事件的1954年写起，重点描写时年55岁的俞平伯先生先是在1954年8月13日至20日作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然后仅在一个多月之后，即10月16日却遭遇领袖毛泽东发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对他的点名批判。若从更深一层的历史还原来看，1954年“批俞”事件的最初意图，在于肃清胡适思想体系的影响；肃清胡适影响，又是为了“改造”从国统区过来的知识分子；发起“批俞”事件之后，又揪住了“批俞”会上主

动跳将出来的胡风；开展“批判胡风”运动，又一气呵成了“肃反运动”。如此说来，俞平伯先生作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遭到举国批判的第一位学者无疑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是非红楼》即以此作为整部传记的时间起点，从第二章起依次为：《“红楼”风雨骤》《避难进“红楼”》《亲友情何堪》《吾更爱真理》《两度故乡行》《慰妻办曲社》《犹不废红学》《沉浮“文革”中》《乐天揽晚霞》《重演曾祖运》，最后第十二章《遗愿驾鹤去》重在介绍1990年俞平伯先生临终前慎终追远，依旧反思自己一生学术得失。《是非红楼》通过近半个世纪细腻生动的历史叙事，一方面向后还原俞平伯先生遭受举国批判的后半辈子的人生历程，钩沉他与众多文化名人交往的往事；另一方面则往前回顾他早年的人生经历与学术生涯，并由此远溯作为近代中国四大文化名门浙江德清俞氏后人的家学渊源，从而在历史还原中有效提升了传记的内在容量。

二是历史评价。《是非红楼》虽非学术著作，但其既已确立以1954年“批俞”事件为历史起点，以俞平伯先生的红学研究历程为重心，而且冠之以“是非红楼”之名，显然就不能不涉及对俞平伯先生红学研究成就与品格的历史评价。其中的关键所在即在于将俞平伯先生作为“新红学的奠基者与反思者”加以总体定位，然后重点以下述两种方式依次展开：其一是主要蕴含于历史叙事之中的学术评价，诸如第一章《荣辱逢同年》论及1950年俞平伯先生主动承担《红楼梦》八十回本的校勘整理，至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2年出版《红楼梦研究》以及1954年发表《红楼梦简论》，正是后者直接引发了“批俞”事件；第三章《避难进“红楼”》论及“批俞”事件发生以后，

俞平伯先生依然埋头校勘《红楼梦》八十回本，并撰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序言，后题为《〈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序言》发表于《新建设》1956年第5期；第八章《犹不废红学》论及俞平伯先生自1956年5月开始公开发表红学文章后，一直持续到“文革”前夕不废红学研究；第十章《乐天揽晚霞》论及“文革”结束后，俞平伯先生同时迎来学术著作出版高潮期与红学研究活跃期，后者包括1980年5月26日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举办的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提交书面发言，1986年1月20日出席社科院文研所举办的“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庆贺会”，1986年11月访问香港并作学术演讲。其二是对俞平伯先生红学研究成就与品格的学术总结，集中体现在第十二章《遗愿驾鹤去》，重在介绍俞平伯临终之前对自己一生学术得失的反思，其中写到俞平伯先生外孙韦柰看到已经近乎瘫痪的外公坚持提起颤抖的右手，用笔写下两张勉强可以让人辨认的字纸。一张写着：“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另一张写着：“千秋功罪，难于辞达。”鉴于人们惯见名人一般到了终老，往往都要隐恶扬善、粉饰自我。特别是对一位学者或者思想家来说，大凡都想将自己耗费一辈子精力建树的学术体系传诸后世，谁都不会老来还去自我撼动。然而俞平伯先生的卓尔不群在于：愈是步入晚年，愈是反思自己红学人生的是非得失，而且当其生命进入倒计时，想要纠正自己过去“拥曹贬高”倾向的想法愈加迫切，甚至不惜推翻自己业已被人们普遍追捧的红学成就，一反人们总想最终维持自己学术体系以求盖棺论定的世俗做派，体现了他对真理探索到死的不朽精神，这是一个学者临终自责的罕见案例，充分展示了真正学问家的良心和勇气。的确，自1954年“批

俞”事件发生之后，俞平伯先生并非以此为怨天尤人之缘由，而是作为自我学术反思之契机，而且一直延续至1990年临终之前都不放弃，贯穿于其晚年的两大核心观点，即是对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固有价值评判的反思，以及强调《红楼梦》的未来研究方向应该多从文、哲两方面加以探讨。若将其间俞平伯先生所作的反思加以梳理和总结，则可以从自我评价的特定视角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上述学术评价之功能与价值。

三是历史反思。基于历史还原、历史评价基础上的历史反思，正是《是非红楼》的一大亮点所在。除了“批俞”事件所折射的学术政治化悲剧的沉痛教训之外，从这一历史事件的焦点人物俞平伯先生本身加以透视，则更能引发超越于“批俞”事件之外的深刻思考，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着重提到的：

俞平伯先生被竖为“箭垛”以后，当时承受的压力是空前的，他没有先例可以自我慰藉，想要自保，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和样本可循。然而，恰恰是他，居然能够不断躲过后来几次“运动”特别是漫长的“文革”刀锋，一直活到亲眼看到自己平反余庆、梅开二度的盛景后，方以91岁高龄寿终正寝。应该说，在生活条件远不如现在的上世纪末，活到这个年纪是不多见的。于是，我还想探究，俞平伯先生到底有着怎样一段命运遭际和心路历程呢？他又秘藏着怎样一种纾难解压的生存智慧呢？

另外，“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后，党中央实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前阶段挨批受压的名人们大多纷纷伸张个人冤屈。但

俞平伯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挨批受压的名人，不仅没有加入申冤“大合唱”，反而兀自反思起其红学历程来。他深刻自忖早年追随胡适尊崇曹雪芹所著前八十回，贬低高鹗所续后四十回的过往，特别是他进入生命倒计时之际，还毫不顾及身后尊谥，宣称自己和胡适“腰斩”《红楼梦》“有罪”，这又是怎样一种学术态度和人格力量呢？

与此同时，《是非红楼》中也不时闪烁着来自友情、亲情的暖流，同样值得细细品味。比如第四章《亲友情何堪》所载“批俞”事件发生以后，俞平伯先生的家人以及王伯祥、顾颉刚、叶圣陶等友人对他的关怀和安慰；第九章《沉浮“文革”中》所载“文革”中后期俞平伯先生与叶圣陶、顾颉刚、章元善、王伯祥“京城学界五老”的深厚交谊；第七章《慰妻办曲社》所载俞平伯先生见批他以后又批胡风，夫人许宝驯再次担惊受怕，于是针对夫人会唱昆曲的特长，主动联络同好，利用自家房子，办起了北京昆曲研习社，既为保护古老文化，又为夫人惊涛安澜。这些游离于宏大历史叙事之外的友情、亲情的相互慰藉，更加彰显了患难之际的人性光辉，弥足珍贵！

以上历史还原、历史评价与历史反思三者既逐层展开，又相互支撑、相互包容，充分体现了《是非红楼》作为学者传记的特色性与完整性。假如作者能更紧密地结合红学史的学理研究，并在历史叙事中更巧妙地处理好时间序列以及纵横交叉的关系，也许会使《是非红楼》更为缜密，更为精彩。

应该说，由文毅来写作《是非红楼》，还是颇有某种“缘分”的。文毅是湖州吴兴人，与俞平伯先生是同乡，此前相继有《旧燕知草：俞平伯人生智

慧》（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俞平伯与德清》（浙江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等论著出版，已为《是非红楼》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文献与经验，而且所幸的是，承蒙《传记文学》编辑部主任胡仰曦女士以及《文学评论》原常务副主编胡明先生的提携和指导，《是非红楼》先以《俞平伯1954年以后的岁月》为总标题连载于《传记文学》2017年第7期至第12期，而后再列于“《传记文学》丛书”，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相信这些学术机缘与激励，皆已成为“催化”《是非红楼》问世的重要环节和内在动力。

是为序。

2018年7月29日

目录

Contents

- 1 | 第一章 荣辱逢同年
- 25 | 第二章 “红楼”风雨骤
- 57 | 第三章 避难进“红楼”
- 67 | 第四章 亲友情何堪
- 89 | 第五章 吾更爱真理
- 111 | 第六章 两度故乡行
- 143 | 第七章 慰妻办曲社

167		第八章	犹不废红学
185		第九章	沉浮“文革”中
221		第十章	乐天揽晚霞
249		第十一章	重演曾祖运
267		第十二章	遗愿驾鹤去
293		后	记

第一章 荣辱逢同年

1954年，是现代作家、诗人、学者、红学家俞平伯91年生命中的一个堪称奇异的年份，这一年里，他经历了九旬人生中唯一一次大起大落：同一年里遭逢了荣耀和屈辱。

所谓荣耀，是当年8月13日至20日，俞平伯被在杭州召开的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为全国人大代表，成为五年前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组成人员之一；所谓屈辱，是当年10月16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支持两个初涉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小人物”李希凡、蓝翎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提出批评的两篇文章，从而引发全国性的批判运动。这一运动，史称“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事件”。

这一年，俞平伯55岁。他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受到点名批判的知识分子。

俞平伯受到点名批判的头一天，即10月15日，据他的表哥兼姐夫许宝蘅日记记载，北京是个秋高气爽、风和日丽的宜人秋日，因此，许宝蘅约了当年与他一起为末代皇帝溥仪做事的陈曾任（字觉先）、陈曾畴（字农先）、徐仁钊（字勉甫）等旧日同僚，结伴游了北海公园并进行野炊。许宝蘅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

10月15日，十九日甲辰九时三刻到北海双虹榭，勉甫已至，少